

西藏文明研究系列

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

石 硕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石硕著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 / 石硕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3

(西藏文明研究系列)

ISBN 7-220-05355-X

I. 藏... II. 石... III. ①藏族-民族起源-研究
②地方史-研究-西藏-古代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156 号

ZANGZU ZUYUAN YU ZANGDONG GUWENMING

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

石 硕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刘周远 江 风
刘 双
戴雨虹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公司

850mm × 1168mm 1/32

11

4

235 千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1—1500 册

ISBN 7-220-05355-X/K·733

32.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本书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系统探讨和研究藏族族源与藏东横断山区古文明渊源关系的学术著作。全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新的、更为深入的挖掘，并广泛运用敦煌古藏文写卷、藏汉史籍以及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乃至藏东各藏缅语民族的史诗传说、文化习俗等材料，对远古时代曾与西藏腹心地区氏族发生渊源关系的藏东横断山区氏族人群的族属系统、演变源流、宗教特点及文化面貌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结论认为，同西藏腹心地区早期氏族发生渊源关系的横断山区古代人群并非是人们过去通常所认为的“羌”，而应是汉文史籍记载中明显与“羌”有别的另一个大的族群类属——“夷”。该族群系统不但是我们目前所知藏东横断山区时间最早和最古老的土著，同时也是今彝语支民族较为直接的祖先人群。本书的研究，对于从民族系统上重新认识藏东横断山区的古代文明、重新认识藏族族源及与藏东古文明的渊源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序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藏东古文明”的概念与地域范围·····	(10)
第二章 猴祖传说:一个隐含藏族起源真相的文本 ·····	(16)
第一节 藏族关于自身来源的三个传说·····	(16)
第二节 关于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衍生藏人传说之 背景·····	(24)
第三节 对藏族猴祖传说中“猕猴”与“罗刹女”含 义的释读·····	(31)
第四节 关于“猕猴”种系人群的最早居住地·····	(41)
第五节 横断山区藏缅语民族中关于祖先来自北 方的传说·····	(54)

第六节 “穆”、“恰”联姻:猕猴与罗刹女婚配传说 之蓝本·····	(69)
第三章 “穆”氏族与横断山区民族的渊源关系·····	(97)
第一节 “穆”氏族与彝语支民族的关系·····	(97)
第二节 “穆”氏族与纳西族的渊源关系·····	(104)
第三节 “穆”人宗教(笃本)与东巴教的关系·····	(109)
第四节 “穆”人所传的宗教与藏地古老本教—— 笃本·····	(126)
第四章 关于“穆”人族属问题的探讨·····	(155)
第一节 确定“穆”人族属的方法与途径·····	(155)
第二节 彝语支民族与古代夷人的族源联系·····	(159)
第三节 关于彝语支民族属夷系民族的语言学证 据·····	(171)
第四节 “穆”氏族:横断山区的古代夷人 ·····	(184)
第五节 嘉戎族群:横断山区古代夷人之后裔 ·····	(193)
第六节 嘉戎与彝语支民族和藏族的渊源关系·····	(209)
第五章 从考古文化系统看横断山区的古代夷人·····	(241)
第一节 横断山区石棺葬是古代氐羌人的遗留吗·····	(241)
第二节 石棺葬与横断山区古代夷人的对应关系·····	(251)
第三节 从考古文化看横断山区与卫藏早期人群 的关系·····	(265)

第六章 结 语	(294)
第一节 “穆”、“恰”联姻与西藏早期历史	(294)
第二节 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	(305)
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	(325)
附录二 作者藏学著述目录	(337)
后 记	(343)

第一章

序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藏族起源问题历来是藏学研究中一个颇受关注的领域。在 80 年代，有关藏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曾出现过一个小高潮，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大大推进和深化了学术界有关藏族起源问题的认识。综观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有关藏族起源的研究成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和进展：

一、藏族源于“印度”说受到普遍质疑和摒弃^[1]；

二、传统的源自于新、旧《唐书》的藏族源于“西羌”或“鲜卑”之说开始受到挑战，一些学者对这两种说法能否成立均提出了普遍的疑义^[2]。

三、随着西藏高原新、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资料的进一步丰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逐步接受或认同藏族“本土”起源的观点^[3]。

需要指出，80年代以来尽管在对藏族起源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上述重要进展，但却并未能够达成共识，也就是说，至今人们对于藏族的起源问题仍未能够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此局面不仅反映了藏族起源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对藏族族源的研究仍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不过，在80年代以来有关藏族起源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一种颇值得注意的观点，即一方面承认藏族族源有着土著即本土的起源，但同时也认为藏族来源中也明显包含了来自藏东地区的氏羌民族的成分，有人将此观点形象地将其称之为“混合说”^[4]。最初提出此观点的是以西南考古研究见长的童恩正教授，他在由他参与主持的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报告《昌都卡若》的结论中，对藏族的来源作了这样的阐述：

“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两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氏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以后西藏的种族和文化，有可能就是以这两者为主体，再接受其他的因素综合而形成的。”^[5]

童恩正先生既然是在《昌都卡若》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出这一观点，该观点显然有较为充分的考古学依据。但同时，也有其他学者提出类似的想法。如应安民先生也曾指出：“各地藏族又由于各方面历史条件的差别，在族源上也有差异，大体上今西藏藏族主要源于土著居民（其中一部分是羌人，一部分还未搞清楚）和迁徙戎羌的结合。甘青川藏族主要源于戎羌，其中融合了一部分三苗的成份。”^[6]格勒先生在《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一书中则引证大量的考古材料、传说和民族学资料，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他指出：“从宏观的角度看，藏族源于三大原始民族系统的融合。这三大原始民族系统就是本地的土著民族系统，北方的胡民族系统，东方的氐羌民族系统。”^[7]据此，格勒先生进而提出了对藏族起源的总体认识：

“我的意见，藏族总的来讲是一个多源的民族。所谓多源就是公元6至7世纪以前（即藏族形成以前），藏族地区的原始民族成份具有不同的系统特点。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至少可以区分出三大原始民族系统。其主要依据当然是考古材料。根据西藏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代表藏族先民文化的卡若文化、曲贡村文化等，一方面具有地区性土著文化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黄河流域氐羌民族系统的文化因素和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狩猎型的文化因素。同时，有些文化因素明显属于南方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

海的原始文化。因而，我认为藏族无论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是单一的。它的血统具有混合性特点。它的文化具有多重性特点。”^[8]

应该承认，这种将藏族族源确定为“多源”而不是某个单一来源的认识，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准确地理解藏族起源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和进步，这也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关于藏族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的最具实质性的突破。它彻底改变了以往在对藏族起源问题的认识上所流行的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简单、陈旧的思维模式，在研究角度与思想方法上为更真实、客观和科学地认识藏族族源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思路。

笔者不仅完全赞同藏族族源“多源”的观点，而且认为此观点乃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探讨藏族起源问题所必需遵循的前提和基础。不过，本书的宗旨并不是要全面地讨论和回答藏族的起源问题，因为在现阶段和现有的资料条件下，作这样的尝试恐怕还为时过早，同时也非笔者的能力与学识所能胜任。本书所要做的只是对有关藏族族源问题的一个方面——藏族族源与藏东即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古文明的关系——进行一个初步的和相对系统的讨论。这一论题在整个藏族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只能说是一个方面的专题研究。虽然本书所讨论的范围主要仅限于西藏早期文明与东部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古文明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的古文明是同西藏早期文明发生联系、交融和影响的惟一的文明，因为我们对此论题的讨论首先是建立在藏族族源“多源”这一认识前提

之上，至于西藏早期文明同其他方向上的文明在种族与文化上所发生的交融与联系，笔者认为肯定是存在的，只是因其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而暂不予讨论罢了。这一点是特别需要说明的。

关于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这一点，早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事实上，无论是过去长期居主导地位的藏族族源“西羌说”，还是80年代提出的西藏土著居民与氏羌系统居民“混合说”以及格勒先生提出的藏族源自土著民族、北方胡民族和东方氏羌民族这三大原始民族系统的融合的观点，它们都包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藏族族源与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古文明即所谓氏羌系统的文明存在着异常紧密的联系。所不同的只是，“西羌说”是把东部的西羌当作了藏族先民的唯一来源，而“混合说”则认为西羌并非是构成藏族先民的唯一来源，而仅仅是来源之一。

但是，我们不难注意到，在迄今为止所有涉及藏族起源的论著中，有一点非常一致：即均将同藏族族源有密切联系的藏东古文明在族属上界定为氏羌系统的文明。这不仅成为定论，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认识已是一个下意识和几乎无需思考就能接受的事实。这一看法的缘起，追根溯源，显然主要与《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西羌在秦献公时（公元前384～362年）“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的记载有关。此后，《旧唐书·吐蕃传》记“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新唐书·吐蕃传》也进一步记载“吐蕃本西羌属”，均与《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相互呼应和衔接。羌人既然是从赐支河即黄河上游处向南和向西迁徙并进入了西藏高原，那

么来自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并与藏族族源发生了密切联系的古代人群显然就应该是属于氐羌系统的居民。这从汉文史籍的记载来看，似乎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将与藏族族源有密切联系的藏东古文明的性质确定为氐羌文明系统的观点，长期以来不仅完全主宰了我们对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二者之关系的认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对藏东即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古文明内涵的进一步认识。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将藏东古文明确定为氐羌文明的观点主要是以汉文史籍的记载为依据，确切的说，是以《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羌人从黄河上游处向南和向西迁徙的记载为基础而逐步得以确立的。这就意味着，该观点事实上乃是出自古代中原史家笔下的记载，它是当时背景下中原史家以中原中心之立场和角度去看待西方的部落与民族而得出的一个看法。故这一看法本身存在有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从有关史实记载看，这一看法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从先秦至两汉，被称作“羌”的人群在汉文史籍的记载中是一个相当笼统和模糊的概念。这正如东汉人许慎在《说文》卷四上释“羌”时所云：“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9]东汉人应劭在《风俗通》中亦云：“羌，本西戎贱者，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10]可见，至少在东汉人的眼中，“羌”仍是对西部主要以牧羊为业的人群的一个泛称，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概念。这恰如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所言，在汉文史籍的记载中，“‘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新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于华夏心中的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著‘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11]所

以，如果说“羌”这一称谓可以算作一个“民族”的话，它的意义也仅在于当时华夏人群是以此来划分和确立了我族与西方他族的界线。而被华夏人统称为“羌”的人群却很难看作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言的某一个特定的“民族”。这正如近代中国人曾将西方人统称为“夷”而“夷”本身并非是一个民族一样。因此，从这一意义来说，依据古代中原史家笔下关于“羌”的记载而把与藏族族源有密切联系的藏东古文明完全确定为氐羌文明的观点，在科学性以及基本概念上显然存在问题。

二、尽管“羌”在汉文史籍记载中是一个较为笼统和宽泛的称谓，但从汉文史籍的记载看，羌人的原始分布中心是在黄河上游今河湟一带却大体无问题。对此，学者们的看法也大体一致^[12]。据马长寿先生考证，古羌人的原始分布范围大体是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他们分布的中心是在青海东部古之所谓‘河曲’（黄河九曲）及其以南以北各地”^[13]。这就意味着，《后汉书》所记载的古羌人向西或向南发生的迁徙，均应当是与其最初的居住地即青海东部河湟之地为中心而向外迁徙的。羌人向西的迁徙这里姑且不论，单就向南迁徙而进入了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的羌人来说，如果我们依据汉文史籍中关于羌人曾向南迁徙的记载把藏东即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的古文明完全确定为羌人的文明，这就意味着必须存在这样一个前提，即在羌人自河湟地区南下之前，整个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区即包括今西藏昌都、川西高原和滇西北高原这一辽阔范围乃是一块空无人迹之地。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藏东古文明为羌之文明的论断才能得以成立。那么，在羌人由

河湟地区南下之前，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是否确为无人之地？如果没有，如何加以证实？相反，如果有，那么这些人又应当属于什么样的人群，他们与南下的羌人之间存在何种区别与联系？这些问题均是将藏东古文明确定为氐羌文明的传统观点必须作出回答而至今未予回答的问题。

三、最近数十年来，随着青藏高原东缘地区考古发现和发掘材料的日渐丰富，有关这一地区早期文化面貌的认识也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从现已取得的考古发现资料看，这一地区文明起源的时间相当早，而且呈现了明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同传统的将该地区的古文明笼统确定为由河湟地区南下的氐羌文明的想法显然有不相吻合之处。

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将藏东古文明确定为氐羌文明是一个传统的和普遍流行的观点，但这一观点本身却存在诸多问题，有明显的漏洞和矛盾之处。因此，从这一意义来说，对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之间的关系作新的和更为深入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随着藏东地区考古发现材料的不断丰富，不但为我们认识和探讨这一地区早期文明的确切内涵提供了依据，而且为我们比较该地区与黄河上游河湟地区考古文化之间的异同及联系提供了可能，从而也为我们更为深入细致地来认识和检讨藏东古文明是否为氐羌文明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可能性。

此外，影响并限制我们对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关系作深入认识的另一个重要障碍是，由于长期流行藏东古文明即是氐羌文明的观点，这也决定了过去对于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关

系的认识和讨论主要是依据汉文史籍记载来进行，特别是依据汉文史籍中有关羌人活动和向西向南迁徙的记载来进行。但是，由于汉文史籍中仅仅记载了羌人由河湟地区向西和向南迁徙一事，而对羌人西迁或南迁以后的情况并未作具体记载，所以对于向西或向南迁徙的羌人具体是怎样与西藏早期的土著居民发生交往和联系的，汉文史籍本身并未提供答案。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对该问题的研究始终停留在一个较为表层的水平上，难以得到深入。因此，过去那种将藏东古文明笼统确定为氐羌文明并主要依据汉文史籍中有关羌人活动和迁徙的记载来认识和探讨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关系的思维模式，实际上相当程度已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陷入了某种困境，并大大限制了我们的理解和认识该问题的思路与视野。

为此，本书所要进行的对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关系的研究，将努力避免过去那种在一开始即先入为主地将藏东古文明定性为氐羌文明或其他某种文明的做法，同时，本书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史料依据及切入点也并非汉文史籍中关于羌人活动和迁徙的记载。如果说，过去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视点和思路主要是自东向西进行——即主要是以汉文史籍中所载的东部羌人的活动和迁徙来探寻它们与藏族先民的联系，那么，本书的研究视点与思路则正好是逆向的——是自西向东来进行——即主要是从藏族的起源传说及藏文史籍中所反映的藏地早期人群的活动及其文化现象来探寻他们与藏东古文明之间的联系。同时，本书对藏东古文明内涵的探讨，除了依据该地区的考古文化进行分析和比较外，也将大量依据今天在藏东民族中留存下来的各种史诗、历史传说、文化现象及习俗等等来进行。当

然，本书也要尽可能地利用汉文史籍中有关藏东地区古代各部落活动情况的记载。但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在资料的运用上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本书的研究并非单纯建立在某一种史料基础之上，恰好相反，对藏文史料、汉文史料、考古发掘资料乃至对各相关民族的史诗、历史传说、文化现象及习俗等民族学资料的广泛利用与挖掘将是本书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对上述四种资料的相互参证、相互比较与相互配合，很大程度也正是本书之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

总之，本书将力图从一个新的思路与新的切入点来考察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的关系。笔者相信，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专题性的研究，不仅对我们了解藏族的起源问题以及西藏早期文明的面貌与构成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青藏高原东缘地区远古文明的内涵乃至揭示今天横断山脉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渊源与流变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二节 “藏东古文明”的概念与地域范围

在具体进行讨论之前，首先需要对本书所使用的“藏东古文明”这一概念作必要的界定。

需要指出，“藏东”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本身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单就字面意义而论，“藏东”一词在狭义上可以理解为“西藏东部”，而从广义上则可理解为“东部藏区”，这两者实差之千里。因此，对“藏东”这一地域概念的使用，